

陳捷先著

清史雜著
(二)

學海出版社
印行

22
28

03
(1)

陳捷先著

清史雜業
(一)

學海出版社印行



清史雜筆

(二)

著者：陳

捷先

出版者：學海

出版社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一〇〇二號

發行人：李善馨

發行所：學海出版社

台北市信義路三段一五七巷十弄二號三樓

電話：七〇七一六九六三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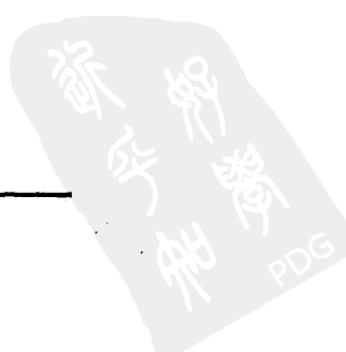
台北市郵政信箱二四二八九號

郵政劃撥帳號一四三五四號

定價：新台幣五〇元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八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清史雜筆 第二輯

目 錄

一、「清代名人傳略」平議	一
二、論「八旗通志」	二五
三、金梁「滿洲秘檔」評介	五五
四、滿文「起居注冊」之現況及其價值	六九
五、「湯若望傳」中之清初史料	一三
六、「太平天國戰圖」景印記略	二七
七、宮中檔光緒朝奏摺出版前記	四一
八、影印袁世凱奏摺專摺弁言	五三

「清代名人傳略」平議

民國三十二年，西元一九四三年，在戰雲瀰漫，生活艱難的時候，美國國會圖書館亞洲部主任恆慕義（Arthur W. Hummel）先生和若干位亞、歐、美洲的學者，花費了多年的時間，整理了我們中國自明清以來若干名人的傳記和後人研究他們生平事功的成果，並且彙集出版了一部空前的大著作，定名為「清代名人傳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在當時實在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也是一項偉大的成就。

這部書一共收錄了八百多個清代的名人略傳；如果包括與這八百多名人有關的兄弟子侄以及他們的門生幕客在內，文中談到的人物可能有一千五百人之多。在這些人中，有帝王，有后妃，有武將，有文臣，有思想家，有藝術家，凡是在清代有事功成就的人，可以說都收羅備至了。這部書出版以後，確實震驚了國際學術界，胡適之先生在為這書寫序的時候就說：「……就目前而論

，無論用那一種語文所寫成的這一類的書，包括中國文字的在內，在構思的宏遠、處理的客觀以及普遍的實用等方面，還沒有一本可以和它相匹配的。」難怪我們國內學者有稱譽這部書是「空前未有將永垂不朽的清代名人傳略」的。

據當時中外學者一致舉出的，這部書的優點大約有以下幾處：「一、這是一部新而且集大成的著作。這二三十年來，國內的學者，如胡適之、陳援安、顧頡剛、丁文江、容肇祖、錢穆諸先生的努力，作了不少的年譜傳記，有的用單本印行，有的在各著名雜誌裏發表。國會圖書館大概都把這些書誌買來，用作參考資料。又博考群書，如有未被諸先生用過的新材料，便更為補苴。二、不但集中國人研究之大成，且集外國人研究之大成。日本及歐美的漢學者，也作了一些清代名人的傳記，纂譯時也同樣的採用了。可是清代是與歐美交通的時代，還有一部份史料是外國人用外國文字記下來的。我國的學者，許多沒有治外國文字的機會，便把這一部份史料忽略了。如明清之間的天主教士，在臺灣與鄭成功爭雄的荷蘭人，鴉片戰爭後的東印度公司與基督教傳教士，幫助太平天國與幫助撲滅太平天國的西洋人，對於中國人士都有很深的接觸，都有詳細的記載。這部傳記又都把這些材料儘量的使用了。三、清朝以邊族入主中國，在未入關以前，已經有了它自己的文學。後來，又併吞了蒙古、新疆、西藏，語言文學更為複雜，譯以華文，益覺紛亂；雖經康

熙、乾隆兩個有些聰明的皇帝，一改再改，總是不能統一，而且愈改愈亂。自從外國東方學者，就原來的意讀用羅馬字母拚出來，再將舊譯一些不同的漢字注在下面，不但看來一目了然，而音譯亦自然的統一了。傳內凡遇到這些地方，都是採用這個方法。又早期的外國人到中國以後，總是要起個華名華字；傳記內於這種地方，又把他們的華名華字注在原名之後，看起來與注滿音聲音一樣的清楚。我們的學者，很少有人能用這樣的方法。……」（註一）

除了以上的這些優點以外，我本人倒覺得「清代名人傳略」一書中在每位名人之後，附註了一些有關這位名人的資料是極為有用並值得我們注意的，例如多爾袞這位清代宗室，撰寫人在敘述了他一生事蹟以後，在文末附加了一些註文，告訴我們有關多爾袞的生平還可以參看「清史稿」卷二二四頁一；「清史略傳」卷二頁一；「國朝耆獻類徵」卷三頁一；「碑傳集」卷一頁四；民國二十二年出版的「多爾袞攝政日記」；「掌故叢編」第三、四號洪承疇的有關記述；蔣良騏「東華錄」卷四、六等處；「文獻叢編」第二十期；俞正燮的「癸巳存稿」卷九頁五；D. H. Bell的「中國史」(History of China)頁四二四；「東華錄」及「清實錄」卷一至卷八；孟森先生的「八旗制度考實」(載民國二十五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號第三分本頁三四三至四一二)；鄭天挺的「多爾袞稱祖父之臆測」(載民國二十五年「國學季刊」六卷一期)；

明清史料」有關洪承疇的部分等等的專書和論著，這些小註對從事深一層研究的人是極有裨助的，應該是這部書的大特色和大優點之一。總之，「清代名人傳略」在出版的當時，甚至於在今天，它確是「不易多得而且人人必須要得的一部大著作。」

然而，誠如西洋史家所說的：「史學著作不是真理，常須改寫或修訂」的；在「清代名人傳略」出版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愈感到這句話的真實性。因為歲月長流的沖蝕，「清代名人傳略」的光彩顯然已比以前減退了。雖然它仍舊是一部「空前的」大巨著，而且也是「人人必須要得的」大巨著；但是它的部分內容須要增訂也是不容置疑的事實。現在把我個人的淺見寫在下面，就教於關心這部書的專家學者：

第一、我們知道：清代史料真是浩瀚無涯，多得出乎一般人的想像之外，除官方的、私家的以外，又有漢字的，西文的，甚至拉丁文的、滿洲文的、真是種類繁多，不一而足。自從「清代名人傳略」一書出版以後，新史料的不斷發現是世界學界週知的事實；史料既然多了，並且其中又有不少經過整理甚至出版了，當然這對清代名人的生平事功必有發明和補正的功用，因此「清代名人傳略」一書的內容也就有進一步商榷的必要了。這不是說當年編撰這部書的學者在知識上有什麼欠缺，而是很多史書在出版若干年後常有這種須要訂增的現象。

先就我們國內的情形來看，過去數十年中，清史資料實在發現了很多。以清代名人傳記方面的書檔來說，以前學者找到清代名人傳記有三十三種，並且還編製了索引，頗利檢查。後來又發現八旗通志初集和欽定八旗通志裏也有列傳和人物志的部份，恆慕義先生曾經把這些資料列為清人傳記的第三十四種。可是中國各省的地方志書中也有「官師」、「人物」、「鄉賢」等等的部門，其中不乏新資料，可以補充一般書檔中人物傳記不足的；「清代名人傳略」當初雖也引用了一些這類材料，但不週全，這是值得我們商榷的第一點。同時近幾年來，國立故宮博物院自遼館臺北以後，珍藏的文獻陸續開箱編目整理，發現原來清國史館修纂的清代名人列傳為數有好幾千人，加上稿本、刪節本，可能有上萬的傳記，這是「國朝耆獻類徵」和「清史列傳」中所鈔錄的數量不能比擬的。這上萬篇的傳記原稿，固然有些已見於三十三種或三十四種清代的名人傳記，但也有若干是記載比較他書詳盡或是以前任何傳記中根本不載的而新發現的傳記。這些資料的價值當然是不問可知的。

另外，在故宮博物院的宮中檔和軍機檔中，我們發現萬千的新史料可以用來增補清代名人生平記錄的，這件事我已在故宮博物院印行的「宮中檔光緒朝奏摺出版前記」一文裏略予說明了，現在再舉一些實例來敘述一下。例如「清代名人傳略」第七一九頁，談到盛清名人田文鏡的生平

時，一開始就說：

「Tien wen-ching 田文鏡 (T 抑光)，1662 — 1732, Dec. ?, official, was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Plain Blue Banner」

(田文鏡，字抑光，一六六二年——一七三二年十二月？，官員，是漢軍正藍旗的屬人。……) 從以上的文字中，我們不難了解當時作者不知道田文鏡逝世的確實日期，所以他放置了一個「問號」(?)。實在說來，在「清史稿」、「清史列傳」、「國朝耆獻類徵」、「從政觀法錄」、「河南通志」、「大清實錄」、甚至「雍正硃批諭旨」等等的資料中，都沒有記載他的死亡日期，只知道他大概在雍正十年十一月間過世的。然而，雍正一朝的宮中檔內，除「已錄」的部份大致上可以說是後來的「硃批諭旨」的內容以外，仍有「未錄」與「不錄」的兩個部份，其數量約當於「已錄」的兩倍，這裏面有極多的史料是清代官書中不見的，特別是清世宗本人的和他與若干大臣之間關係的史料，價值之高，真是無以匹比的。就像田文鏡的死亡日期，在他繼任人孫國重的報告中，我們就可以確知是雍正十年十一月初八日了，折換西洋曆法，應該是一七三二年十二月的二十四日。(註二)還有田文鏡的屬旗問題，我認為應該說他是正黃旗人比較合理。雖然他的先世是屬正藍旗，不過到雍正五年，因為田文鏡任職河南巡撫，成績很好，皇帝認為他「忠

正為國，實心盡職」，而又「辦事熟諳，操守廉潔」，為了表示對賢良大臣的厚待至意，清世宗特別把田文鏡一家兄弟子侄共十一人歸入正黃旗。正藍旗是下五旗之一，正黃旗則屬於上三旗，是天子自降的，這種因功或因選秀女而撥入上三旗的事在清代稱為「抬旗」，這是為人臣的莫大光榮，所以田文鏡在當時曾因此感激皇恩而致於「失聲哽咽」過的。（註三）後來清代官修田文鏡的傳記也就都說他是「正黃旗人」。（註四）田文鏡在有生之日既已被撥入上三旗，後世立傳的人理應說他是「正黃旗人」才是，「清代名人傳略」記他是「正藍旗屬人」似乎是欠妥的。從田文鏡的這些簡單例子，我們就可以知道「宮中檔」史料的重要，也從而了解「清代名人傳略」的須要增訂。

軍機處是清朝最重要的中央機關，舉凡軍國大政，莫不總攬。由於清代一切重大政務，照例須要查對舊案辦理的，所以軍機處對於內外臣工所上的奏章，皇帝頒降的諭旨以及經辦的重要事項，都要鈔錄一個副本，或是登入簿冊，存貯以備查考。因此軍機處存有很多的重要檔案，也是研究清史所必需參考的文獻。就以「東華錄」一書的最早作者蔣良騏為例，以前的人都對他的生平只寫上「待考」。「清代名人傳略」中為他寫了一段簡歷，大部份是強調東華錄一書問題的，作者房兆楹先生用筆可以說十分謹嚴了，他照蔣林的傳記、蔣良騏東華錄的自序和盛京通志等資

料寫了蔣良騏的可靠生平；對於蔣啓敬等的蔣良騏家傳則略作採錄。當然對於一個參加過千叟宴的老者並是清代著名史官來說，我們終有了解不夠的遺憾。現藏故宮博物院的軍機檔中，有蔣良騏做江西道監察御史時的奏摺，這項文件不但使我們知道以前為他立傳的人在記事上有錯誤，同時從而我們更了解他曾經為考試制度向皇帝上過報告，指陳當時考場的弊端，並提出杜絕弊端的建議。後來清高宗同意了他的辦法，並且下令實行。（註五）像這樣的事不但是蔣良騏一生的事功要項，也同時是清代考試制度史上的大事件，蔣良騏傳記中不提及是不能的。

至於國外資料，對於清代若干名人的生平也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我們讀過了馬國賢（*Fr. Matteo Ripa*）神父的「回憶錄」，我們對清聖祖的西洋學問的修養和深度就有一個比較客觀的認識；如果我們看過李氏朝鮮和日本的十九世紀末期檔案，我們會對袁世凱於甲午戰爭前夕在韓國的工作有個新的而公允的評價；還有那些與外國人有過交往接觸或是曾經去過外國的人，他們的傳記就更需要國外資料補正了。

總之，由於近幾十年來，國內外有關新資料的發現，清代名人傳記的內容顯然更豐富了，以往有關他們的傳記應作一番增補的工作。

第二、「清代名人傳略」出版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不久隨着來的是一個復興繁榮的

時代，各國學界在安定之中都有可觀的進步，研究日益專深，著述也日形豐盛。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清代名人傳略」顯然有不能趕上時代潮流的缺陷了。在三十多年以前，若干清代名人可能還不為人知；可是到三十多年以後，不但很多人注意到他們，而且已經對他們做了極為有深度的研究。因此若干觀念應作修正了，若干解釋也應該重寫了。舉一個顯著的例子來說，像雍正這個皇帝以及他這一朝的史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研究雍正朝史而著名的學者就有宮崎市定、佐伯富、安部健夫、荒木敏一、寺田隆信、狩野直禎、岩見宏、塚本俊孝等等。我國也有不少學者對清世宗作過專題研究的，如前輩學人中有蕭一山、孟森、王鍾翰等等；近幾年來又有在澳洲的金承藝、在美國的黃培、吳秀良等先生和在國內若干清史專家，發表過的論著至少也在幾十篇左右，對雍正皇帝的的生活、個性、學養、理政，以及其他有關問題都做過深入的觀察和分析，這些都是「清代名人傳略」中所未曾收集的。又如清朝末年的名人和史事，我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學者們的專刊，目前出版的就有四五十種，大家所完成的論文，為數至少百篇以上。如果再加上其他大專院校和各界專家的研究成果，出版的數量是相當可觀的。近三十年來，歐美日本對研究我們近代史的風氣也很盛，單以美國哈佛大學一枝來說，他們編印的「東亞論叢」和「東亞專刊」就有好幾十種，其中多數是討論清末名人和重要事件的文章。其他如哥倫比亞大學、

普靈斯頓大學、芝加哥大學、加州大學等等，各校都有研究中國近代歷史的專家，專書和論著的出版也是相競推出，各有特長。同時美國還有像亞洲學會所主辦的「亞洲研究季刊」等等的專門性刊物，每年也發表很多文章，水準也是很高的。同時以清史而論，日本學界在研究與出版方面也不亞於美國，不論是東京的東洋文庫或是東京大學也好；西京的京都大學或附近大阪、天理等大學也好，研究我國清季問題的學人都不少，著作也是年有增多的。而這些新近的研究成果「清代名人傳略」裏當然沒有收入。如果說「清代名人傳略」是一部「集中國人研究之大成，且集外國人研究之大成」的大著作，在三十多年以前可以這樣說，在今天却不能如此讚譽它了。

第三、我們研究過去的人物和史事，常因資料的不足，而不能十分理想的重建過去的實況。寫出當時人物和事件的真貌真相來。有時也因為研究者的疏忽或處理偏失而導致有問題的解釋和結論。當然也有時因見仁見智的觀點而對同樣資料作成不同看法的；這是研究任何學問所不能避免的事。對於「清代名人傳略」一書之中，我個人以為也有不少地方是值得提出商榷的，也許是原書作者的錯誤，也許是我們見仁見智的看法不同。現在我就舉出幾個代表性的例子說明如下：

(一)在清太宗皇太極和多爾袞等人的傳略中，我們可以看到作者認為在清太祖努爾哈齊晚年皇太極可能擔任鑲黃旗的領旗貝勒，而多爾袞則領有正白旗，多鐸領鑲白旗。清初八旗制度，由於

史料缺乏，本來就不易鉤考出實狀來的。不過所幸朝鮮人在明朝末年好幾次到過滿洲的老寨，親眼看到他們當時部落中的若干情形，並且回國以後還向政府寫出刺探夷情的報告。根據這些材料，經過日本學者鴛淵一、三田村泰助、神田信夫等人的分析整理，確實天命五六年間，皇太極所領的為正白旗、而不是鑲黃旗；當時的鑲黃旗則為努爾哈齊自降。到天命末期，努爾哈齊曾把自領的兩個黃旗分為四份各十五個牛录，分其中三份給當時的幼子阿濟格、多爾袞、多鐸，自己保留了一份。在舊滿洲檔裏我們可以看到多鐸所分得的是正黃，而不是「清代名人傳略」裏所說的鑲白旗。多爾袞兄弟改領白旗應該是努爾哈齊死後的事，不是天命末年的實況。傳略的作意是根據滿洲部族未分家子的習俗而推論的，方法實在有啓發性，未分家子繼承家長財產權也是事實，只是判斷史料上有疏忽，因而導致有問題的結論了。我曾經寫過一篇小文討論這件事，這裏不擬申述了。（註六）至於多爾袞所領的究竟是正白旗還是鑲白旗，本來不成問題的，由於孟森先生早年只根據東華錄簡略的記載來作考證，沒有利用大清歷朝實錄和朝鮮人的親身見聞以及滿洲早年的滿文舊檔等材料，以致誤認多爾袞一直領有正白旗。其實在天聰早期，多爾袞在黃白四旗易主以後，他先領有鑲白，改領正白應該是以後的事才對。

（二）明神宗萬曆十一年，努爾哈齊的祖父和父親在明朝大軍攻打古勒山城的戰火中被明兵「誤

殺」身死，清朝官方記載認為：這不幸事件全因尼堪外蘭這個人教唆而起的；因此事後努爾哈齊以十三副遺甲起兵，追殺尼堪外蘭，報祖父之仇，結果竟使滿洲興起，終致代明有國，可見尼堪外蘭這人對清朝的興起實在有着重要的關係。「清代名人傳略」中說：Nakan is the Manchu word for "Chinese", and Wailan appears to be a Corruption of the Chinese official title yian-wan-lang 員外郎。（頁五九一）。根據史料：尼堪外蘭是滿洲國蘇蘇河部禿隆城的人，滿洲文字的記載裏確是寫為Nikan wailan 這兩個字，早期的漢文實錄中有把他譯成「尼康外郎」的，當然這是根據音譯的，不應該有什麼涵意。孟森先生首先解釋「外郎為指揮使等官之子，應襲職而未奉准襲職者之稱。尼康外郎即建州衛一首領之子，可以承襲衛職者。原作外郎，後改為外蘭，故示其與漢名無關，以掩建州世受明官之跡。」（註七）「清代名人傳略」中釋「外蘭」或「外郎」為「員外郎」，是不是由孟森先生的說法而引起，我們不得而知；不過以上兩種解釋的作者都沒有說出他們說法的依據，則是事實。依照滿洲文字，Nikan 一詞是作「漢」或「漢人」講，wailan 則是指掌理文書工作的人，也就是我們今天所稱的「秘書」或「書記」一類的稱謂。所以「尼堪外蘭」或「尼康外郎」應該是「掌理漢文的書記」或是「漢人秘書」（他不是滿洲人）的意思。我們在朝鮮人訪問建州部落以後的見聞報告裏，看到他們提起有

「文學外郎」和「歪乃」的事，這些人都是為努爾哈齊掌文書的。「外郎」、「歪乃」實在都是 *waian* 的譯音，和員外郎以及指揮使等官的兒子似乎沒有關係。（註八）

在多爾袞的傳裏，有 *mergen daicing* 這個美號。「清代名人傳略」的作者說是「聰明的武士」（*wise Warrior*）（見二一六頁）的意思。實際上這兩字都源出於蒙文，滿文裏 *mergan* 可以算着外來語，是作「聰睿」的解釋，也是多爾袞後來有「睿王」一稱的由來。*daicing* 不是滿洲字，它的字意應是「統治者」，譯成「武士」或「戰士」，似乎稍有出入了。

滿洲部落中早年有不少人被稱為「巴克什」（一稱「榜式」）的，像額爾德尼、阿林察、庫爾纏、希福、武納格等等。清文鑑等書中解釋「巴克什」（*Bakshi*）為「讀書人」、「儒士」；但清人未入關前的「巴克什」却擔任多種任務，如創製文字，辦理外交，翻譯典籍，甚至領兵作戰等等的；不過以「巴克什」為稱的人，都是精通滿蒙文或滿蒙漢文的專家，所以「清代名人傳略」中僅釋作 *Professor* 一字，似嫌狹義了一點（見頁二二五）。

又如清太祖的侄子阿敏的傳裏，「清代名人傳略」說「台吉」（*taiji*）一詞是「蒙古文小王子」的意思（見頁九）。我個人以為這種說法也不很妥當。因為滿洲早年稱過「台吉」還有努爾哈齊的長子褚英，幼弟巴雅喇等等的人，可見並不是努爾哈齊的子侄才這樣稱呼，而暗含「